



敦煌学研究丛书
主编 季羨林



敦煌学史事新证

陈国灿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吐鲁番文书直接补充和丰富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内容
如果将文书与史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创新的局面
必将给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研究带来新的发展
也会给敦煌吐鲁番学带来新的活动和寺院经济生活文书
在敦煌文书里有丰富的寺院僧政系统的各种活动和寺院经济生活文书
这对研究唐代寺院经济极为有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学史事新证/陈国灿著.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敦煌学研究丛书)

ISBN 7-5423-1032-1

I. 敦… II. 陈… III. 敦煌学-史籍-考证

IV. K8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3157 号

责任编辑: 朱富明

责任校对: 付浩前

封面设计: 徐晋林

版式设计: 王保华

敦煌学史事新证

陈国灿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6.5 插页 8 字数 400 千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5423-1032-1/K·60 定价: 39.00 元



唐常乐故城北门(门向西开) 陈国灿摄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陈国灿摄



敦煌市西悬泉
遗址北山谷中之悬
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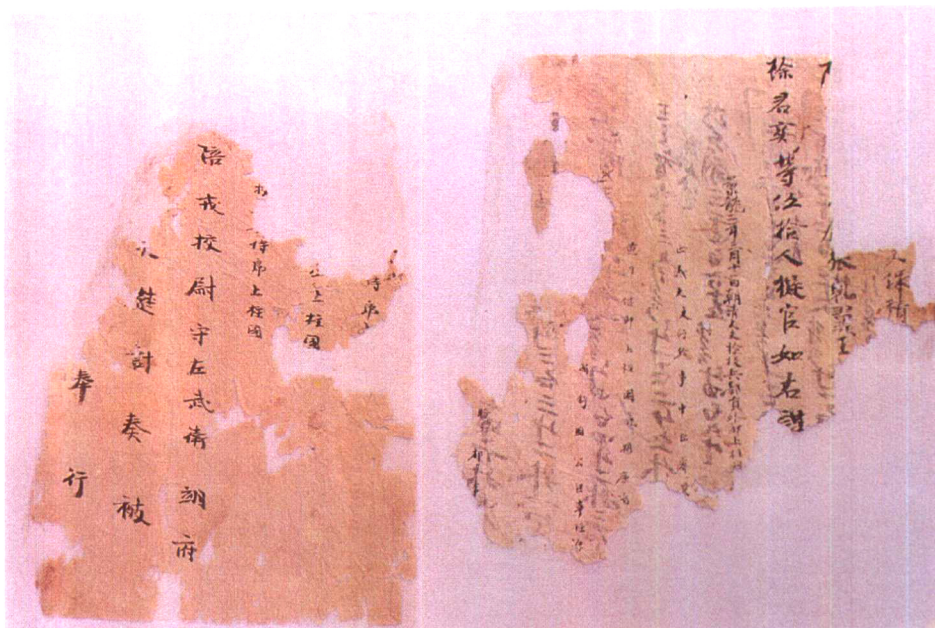
陈国灿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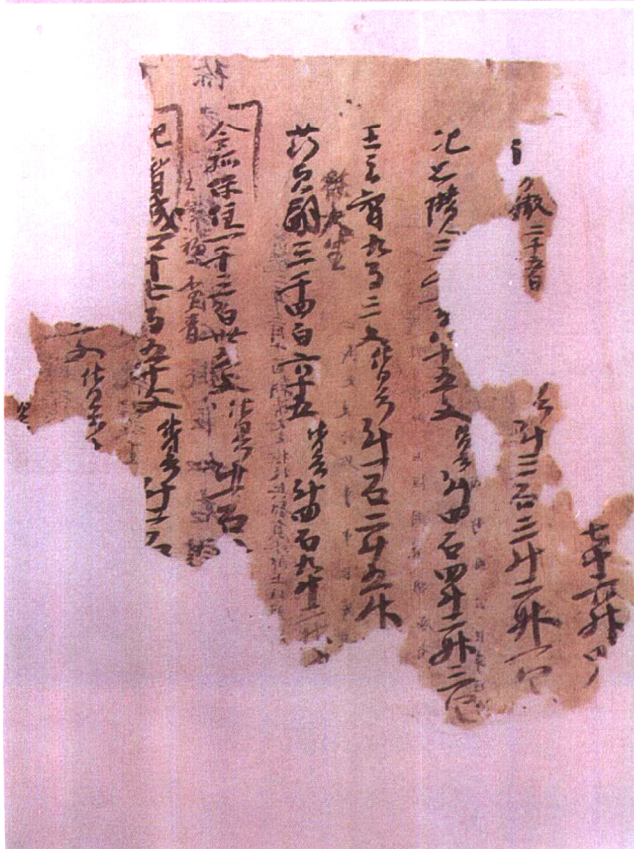
唐瓜州城（今安西县锁阳城）西塔楼

陈国灿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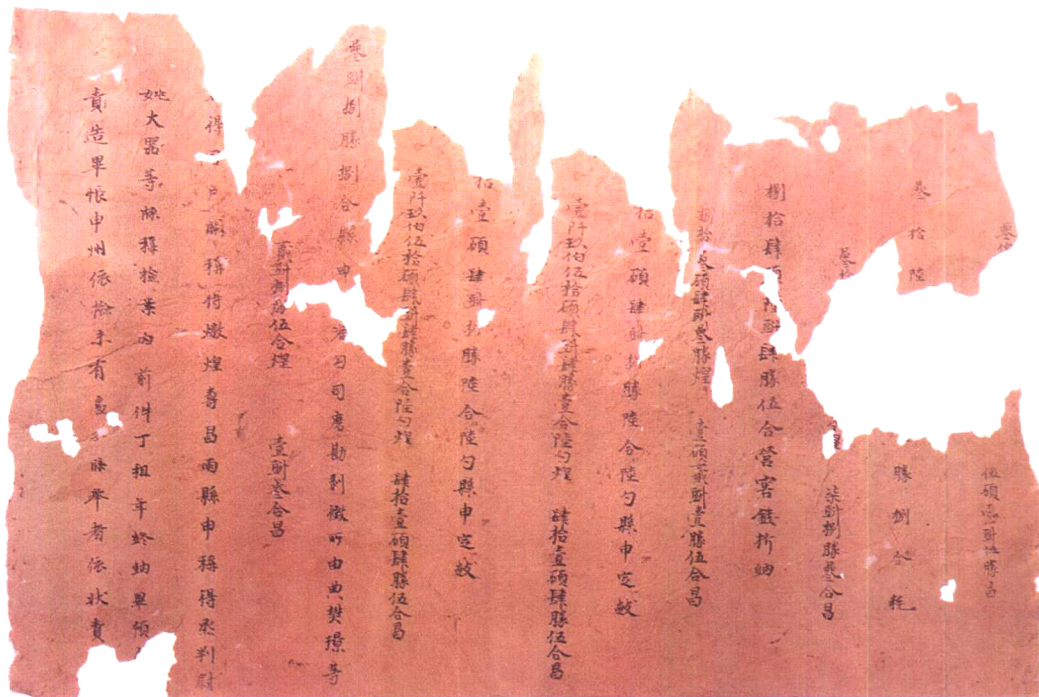




莫高窟北 47 窟
新出唐口楚計告身
敦煌研究院彭
金章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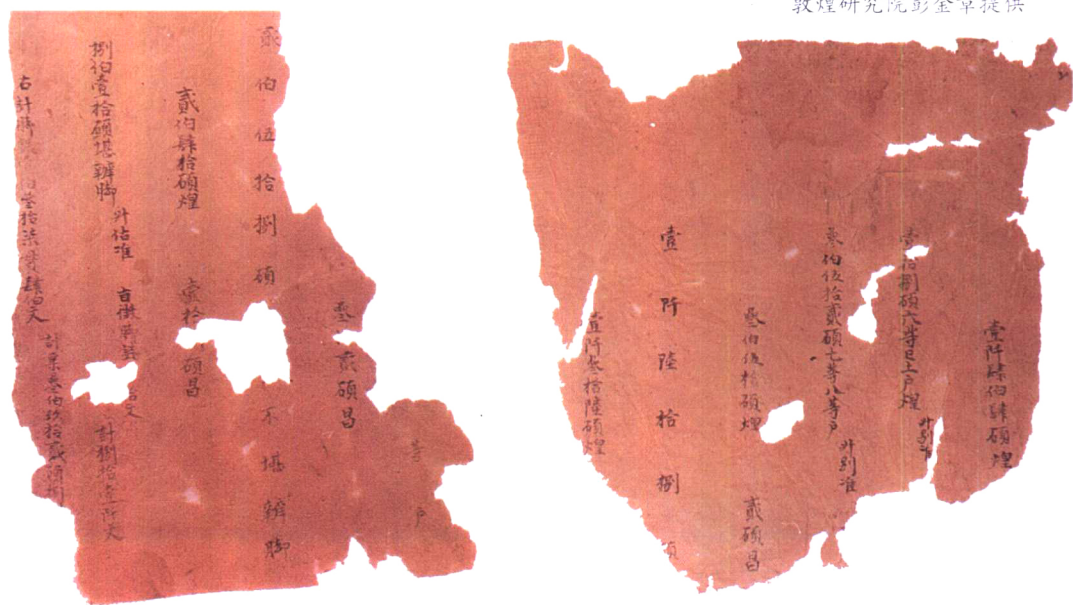


莫高窟北 47 窟
新出唐貸錢折糧帳
殘片
敦煌研究院彭
金章提供



莫高窟北 47 窟新出唐开元廿四年后沙州“丁租牒”之五

敦煌研究院彭金章提供



莫高窟北 47 窟新出唐开元廿四年后沙州“丁租牒”之四

敦煌研究院彭金章提供

甘涼瓜商所右州述产
 條奉表分上件等州以田水稍寬百姓
 志居城主收野少民執作沙州力田爲勞
 小大咸解農功述近板指他州創被控
 張安置字述字收農作極改蜀表家
 僮好子講酬其備惡乃獲生每界各
 宿野先立能論者控其手序爲述之
 時永立創述之集田表出外控種所收
 子符充但賦假有餘饒便入助王全素
 明勅述王振思遠無聞述弟高下給
 複二季又今年述之所有田案官收
 種子付戶助監述王后歸苗稼見在課
 役役免復得田苗或恐之東述王親王
 詔誘重指在此有苗不種耕种無業
 場作田端方便更見此並甘涼瓜商姓
 共述王相和詳稱有苗置作佳計若不
 上振戶條訪使知所慮述王詳端不息
 謹以謹舉一從謹

長安縣志
 卷之三
 田賦
 田賦
 田賦
 田賦

武周長安三年三月括逃使并敦煌縣牒(大谷 2835a 号)

蘇以客肉者貧兒娶妻永元相學鶴望和奈
鞋支揚特貴盡和奈既無定準自候即盡
寒處唯盡空先陰未露誠亦在志士求床
累年勢種自姓至是自依遂請檢校舊田官
使即正別懸閱禁子及布城內縣官自巡有
一家不銷績首得一迴車歇速使庶望規模
連洽純朴相依謹以時舉請載謹陳

長安三年三月

錄事董文徽

月日

錄事

錄事

錄事

錄事

錄事

錄事

錄事

錄事

李 璣 題




















好美眼 好眼

郭雲白

大德至聖懷有文德將降好辭

皇天不弔

三 住持主客僧尼等

自書公金賊見後書

金華張家莊張家莊

此後即與張氏無涉

16-00000

人與萬物皆由氣而生，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故曰：『人之生也，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一、政治思想及政治生活



作者在日本龙谷大学与小田义久教授研究大谷文书 池田温教授摄

序

季羡林

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长时间内，仅有极少数可称为先知先觉的中国学者，筚路蓝缕，置身于世界敦煌学研究行列中。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海峡两岸始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探幽烛微，健笔如椽，在文学、语言、历史、地理、考古、艺术、宗教、天文历法，以及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等方面，都有水平相当高的著作，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瞩目，为中华学术增光添彩，实为学界之盛事，中华之光荣。

现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于对学术成绩的尊重，对乡土宝藏的珍爱，对祖国文化建设的责任，汇集十几位海峡两岸敦煌学研究者的专著和论集，一起出版，集中体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敦煌学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会长，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些著作既是上个世纪敦煌学的总结，也是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的起点，不少文章昭示着新世纪敦煌学的方向。二〇〇〇年，在北京、敦煌、香港、东京等地，都举行了纪念敦煌学百年的学术讨论

会。从去年到今年，在日本京都、中国的杭州和台湾嘉义，又陆续举办了专题或综合的敦煌学研讨会。今年八月，北京还将举行首次全面讨论敦煌学研究史的学术会议，这些都说明二十一世纪的敦煌学仍在蓬勃发展，而且研究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大。

我已年过九旬，仍愿意为敦煌学研究奉献微薄之力。欣闻甘肃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敦煌学研究丛书”，特将近日一些想法写出，作为序言。

二〇〇二年五月十八日

目 录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代序）	1
敦煌高僧竺法护译经考论	28
两件西晋敦煌写卷疑伪考	44
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	56
魏晋至隋唐河西胡人的聚居与火祆教 ..	73
武周圣历间敦煌勘田文案研究	98
武周长安间敦煌括户案卷研究	145
武周瓜沙地区吐谷浑归朝案卷研究 ...	167
唐代的论氏家族及其源流	198
莫高窟北区 47 窟新出唐告身文书的复原与研究	215
莫高窟北区 47 窟新出唐贷钱折粮帐的性质	230
莫高窟北区 47 窟新出唐开元廿四年（736 年）后丁租牒的复原与研究 ...	244



莫高窟北窟新发现的两件唐敦煌户籍残片	265
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五代地子的演变	275
从归义军受田簿看唐后期的请田制度	301
敦煌所出诸借契年代考	327
西夏天庆间典当残契的复原	345
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	360
唐五代瓜沙归义军军镇的演变	384
唐瓜沙途程与悬泉镇	408
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	423
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	445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	472
八、九世纪间唐朝西州统治权的转移	486
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	497
后记	516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魏晋 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

(代 序)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社会状况，在史籍上固然记述不少，可是，在对一些问题进行具体认识时，又常有情况不明之感。或因隐讳不载，或因语焉不详，妨碍了对当时社会的深入认识。这种情形，促使着学者们对当时人留下来的地上地下遗物进行搜集和发掘，除了大批魏晋至隋唐的实物和碑刻外，还有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当时人留下的大批纸质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今天统称为敦煌、吐鲁番文书，而对这些文书内容的探索，直接关系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特点及作用

我国甘肃省的敦煌和新疆的吐鲁番，在魏晋时期，分别设置为敦煌郡和高昌郡，在唐代又分属于沙州和西州，是当时中国通向西域的门户。因而在它的地上地下，也留存有许多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遗物、遗书。加之西北地区气候干燥，水分稀少，使得这些遗物、遗书，常保存逾千年而不腐，它们或长眠于众多的墓葬中；或被当做神明供奉在寺庙里；或密封在石窟藏经洞内。长



期以来，没有被人们发现，或虽发现也未受人重视，只是到了近代，当科学的考古工作发展起来后，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西北文物的掠夺，这些宝库被相继打开并公之于世。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探险家们便将这些珍贵的遗物、遗书一批一批地劫往世界各地。

1895年，当俄国探险队罗波洛夫斯基在吐鲁番古寺庙遗址里，亵渎神灵，劫走古写本经卷后，俄、德、英、日等国的探险家们陆续来到盆地，掠走了大批汉文和民族文字的写本文书。自1912年起，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英国的斯坦因又连续对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古墓群进行了盗掘，劫走大批十六国至唐代的墓葬纸质文书。在敦煌的莫高窟，自1900年道士王圆箎发现藏经洞内四万多卷古写本文书后，立即引起帝国主义的垂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奥登堡、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等又相继从这里劫走了三万余卷。我国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就这样流散到了世界各地，如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藏的“斯坦因文书”、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的“伯希和文书”、俄罗斯圣彼得堡（前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的“敦煌特藏”、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吐鲁番文书”、日本京都龙谷大学藏的“大谷文书”等，都是来自我国敦煌、吐鲁番的古文书。

这些古文书虽然大部分是西晋到唐宋时的写经，但也有一小部分属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始文献，学术价值极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出土有纪年的最早社会文书是《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现藏伦敦，编号为S. 113），最晚的是写有“宋咸平五年壬寅岁（1002年）五月十五日记”的写经（现藏俄罗斯，编号为ДХ1696），就整个敦煌所出社会生活文书而言，还是以晚唐五代宋初文书居多。在吐鲁番文书中，最早者有吐峪沟寺庙遗址所出写有“元康六年（296年）三月十八日写已”题记的《诸佛要集经》残卷



(现藏日本)，最晚者有元代的文书，如高昌古城所出《至元十七年（1280年）善斌卖身契》三种。整个盆地所出也以十六国至高昌国和唐前期的文书为大宗。除此以外，在敦煌和吐鲁番出的文书中，还有一些龟兹文、粟特文、突厥文、吐蕃文和回鹘文的文书。由于这众多的文书在本世纪初就被劫往国外，以致在旧中国的国内学术界欲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也无从大力进行，相反，在有些国家里，一些汉学家们结合中国的历史，却发表了不少对文书的研究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直接关注下，一些流往国外的文书相继被摄制回来，学术界对敦煌文书也作了一些初步的整理、编目，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和哈拉和卓古墓地，进行了十余次的发掘，出土了几近万片的汉文文书，经新疆考古工作者和“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同志们多年努力，已拼合成1800余件文书，并陆续分册出版，其中有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文书；也有高昌王国时期的文书；数量最多的还是唐代的文书，基本上都是当时官私的文案和各种事务交往的记录。所有这些，都为大力开展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敦煌、吐鲁番文书自被发现以来，所以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大力研究，除了它本身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以外，还在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种种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的加工，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从魏晋至隋唐，官府或私家的档案均早荡然无存，敦煌、吐鲁番所出的社会生活文书，虽然大多断残不全，却是这一时期仅存下来的官私档案，对它的分析和研究，必然会使我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历史有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获得新进展。由于文书在内容上包罗万象，对于古代的语言文学、民族文字学、经学、地理学、民俗学、宗教学、